

● 政治学

析小农的皇权政治心理及其形成原因^{*}

袁 银 传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袁银传 (1965-),男,湖北云梦人,武汉大学法学院政治理论系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研究。

[摘 要] 皇权主义既是一种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模式,也是一种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潮。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主义长期存在的深层文化心理根源,乃是小农非主体性的“真主”意识和皇权文化心理结构。小农皇权政治心理的形成原因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和文化原因。

[关键词] 小农;政治意识;皇权心理;皇权主义

[中图分类号] D 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1-0074-04

一、小农皇权政治心理的多维面透视

政治意识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体系和政治哲学三个基本的层面。小农的政治意识基本上停留在政治心理的浅层次上,并且更多的是通过小农的政治情感、政治理想、政治态度等形式表现出来,很难上升为一种政治思想体系和政治哲学。

在政治情感上,小农表现出对皇权冷漠、疏远与对皇权的尊崇、膜拜的双重情感。一方面,由于小农执著自己和家庭的生存和安全,没有时间、精力和兴趣关心政治;加之小农的封闭性、愚昧性以及封建政治是黎民百姓不得过问的神圣领地,造成了小农个人权力意志和政治参与意识淡薄,对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权力缺乏必要的关心和兴趣。另一方面,由于小农的分散性、软弱性,他们又渴望有一种超越每个个体农民之上的强大的社会整合力量——皇权,将众多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以抵御自然灾害,抵御外敌入侵,平分不均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调适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从而为小农的生存和安全提供保护机制。所以,小农对全权全能的皇权又有一种敬仰的崇拜之情。

在政治理想上,小农幻想借助于强大的君主专制权力来实现自己绝对平均主义的政治理想。

在政治态度上,小农在无政府主义与皇权主义之间游荡,并最终走向皇权主义。一方面,由于小农长期从事孤立分散、自给自足的简单再生产,彼此之间缺乏广泛的社会交往和普遍性的社会联系,很难组织起一支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阶级队伍。他们的自由散漫性、无组织纪律性和田园诗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容易形成自发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同时,正是他们的自由散漫性、无组织纪律性,使他们成为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使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不受任何限制的皇权,期望从皇权的怀抱里沐浴雨水和阳光,于是,小农又从无政府主义走向了皇权主义。在这里,一极是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状态,另一极又迷信高高在上的权威和服从层层叠叠的君主专制等级制度,表面上看似矛盾和冲突。实际上,前者正是后者得以存在的可靠基础,而后者又恰好是前者的必然归宿,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这种相互矛盾的政治态度也可以从小农“逆来顺受”与“官逼民反”的矛盾心理中折射出来:一方面,小农胆小怕事、逆来顺受,他们惧怕官府和权力;但是,当出现“天灾人祸”,特别是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压迫太甚,超出了小农的承受能力时,小农也不得不群起反抗、揭竿而起。

皇权主义既是一种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模式,也是一种社会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潮。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和社会思潮,皇权主义是一种横跨和渗透于封建社会传统的政治心理、政治学说和政治哲学等各个意识层次的思想体系。它一是指以君主为本位的理论意识形态,二是指社会上大多数成员尊重和服从君主本位的心态、情感和意向。一个发达的封建皇权政治体制,不仅仅靠成体系的理论意识形态来加以论证、灌输、教化,使其得以维持,而且也以普遍流行的“真主”信仰为其政治文化心理来加以支撑。而且,小农发自内心的政治心理取向和政治信仰,要比典籍形态的纲常名教的说教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支持力。显然,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主义的长期存在是与小农非主体的皇权心理分不开的,或者说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专制主义最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根源和支持系统乃是中国小农非主体性的皇权文化心理结构。

二、小农皇权政治心理的形成原因

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专制主义政治以及东方专制主义长期存在的根源,在政治思想史上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有古希腊政治学家、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有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的“奴性意识说”,有魏特夫的“治水说”,以及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说”。我们认为,无论是从地理环境切入,还是从古代中国人非自由的奴性意识或治水活动阐发,都只是抓住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没有能全面深刻地揭示出中国皇权专制主义长期存在的深层原因。只有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和小生产活动方式出发,特别是从亚细亚生产方式、村社经济、小农经济的特点出发,并结合小农的阶级地位、阶级特性和阶级意识的分析,才全面而深刻地揭示出了皇权专制主义的社会根源。当然,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中,也注意到了治水事业与东方专制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马克思曾谈到:“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共同的条件,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还有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凌驾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1](第468页)显然,马克思是把治水、灌溉放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下作为其中的条件和特点之一谈到的,它只能视作专制主义存在的亚层次的原因。如果把它本体论化,置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上,只片面强调亚细亚生

产方式的“治水”特点而舍弃其它特点,甚至把它作为“终极原因”来解释东方社会(包括中国)所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现象,只会犯以偏概全、舍本求末的错误,同时也违背了经典作家马克思的原意。而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显然是犯了这种错误。

我们认为,小农皇权心理的生成土壤主要是小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和小生产方式、小农依附性的阶级特性和弱者的社会地位以及封建传统政教合一的政治文化,特别是封建礼教对小农心理的灌输和制造。

(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是小农皇权心理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

小农所从事的是以个体手工劳动为基础,以家庭为组织单位,以家长为轴心的简单再生产。这种生产方式所凭借的资源是小块土地,所依靠的生产工具是自然手工工具,所进行的是自然分工和自然血亲交往,而没有广泛的社会分工、社会交往和社会联系,自给性、孤立性、封闭性是其典型特征。而正是小生产方式的这些特点,成为小农皇权心理形成的最深远的原因。

首先,在小生产方式下,“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2](第677页)“各个小公社彼此独立地勉强度日,而在公社内部,单个的人则同自己的家庭一起,独立地在分配给他的份地上从事劳动。”^[1](第468页)正是这种简单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因而必然使其“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3](第765页)由于封闭、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小农的眼光只盯着自己的小块土地和自己的小家庭,对社会的公共事务、公共权力漠不关心,表现出“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马克思语),从而为皇权专制主义统治的存在提供了社会基础。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3](第765页)他们“对各个王国的崩溃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转归哪一个政权管辖,或者改由哪一个君主统治,反正他们内部的经济生活始终没有改变。”^[3](第765页)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中也曾指出:“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通过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

生活闭塞状况的冷漠态度而证明自己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因素。人口的主体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最强大的支柱,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强大的支柱。”^[4](第 484 页)其次,小农所依靠的主要资源是自己的小块土地,而正是这种小农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才是皇权主义得以立足的基地。正像单个的葡萄(小农、小块土地)需要串起来(皇权)、分散的马铃薯(小农、小块土地)需要用袋子(皇权)装起来一样,只有皇权才能将小农、小块土地统一在同一个格局里,才能实现小农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对此,马克思深入地分析道:“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各种关系和个人的划一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一个最高的中心对这个划一的整体各个部分发生划一的作用。它消灭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所以它也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全面介入。”^[2](第 681-682 页)再次,由于小生产方式的孤立性、分散性、封闭性,造成了小农之间的孤立性、分散性和封闭性。由于小农之间、各农户之间、各村落之间没有任何横向的经济联系,因而就形不成任何政治上的联系,他们不可能联合起来形成一种政治力量以与皇权相抗衡,更不可能起来推翻皇权政治统治。他们只有生活在各孤立的“点”上,拜倒在皇权的淫威下,甘受着皇权主义的统治。即使他们被逼无奈起来反抗,揭竿而起,他们也决不是要推翻皇权本身,而只是要铲除“昏君”和“贪官”,迎来赐给自己“雨水和阳光”的“明君”和“真主”。

(二)小农依附型的阶级地位和弱者的社会地位是他们皇权心理的阶级根源

小农生产方式是一种依附型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不可能在任何社会经济形态中占统治地位,它只能以附属的身份依附于其他经济形式,正是这决定了它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在原始公社所有制、奴隶制、封建制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从属关系中都存在,甚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大量附属在社会主义所有制上。小生产方式在经济体制上的依赖性、附属性也就决定了小生产主体——小农政治上的依赖性、附属性。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路线、阶级路线,只能跟着其他阶级走。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贵族阶级的斗争过程中,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同盟军;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斗争过程中,他们又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而在封建社会里,他们也只能是封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这种依附性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在封建社会中,只能依

附于最强大的、全能的、能代表和保护自己的皇权。

对于小农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属性与皇权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作过精辟的论述:“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小农“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2](第 677-678 页)

(三)封建传统政伦合一的政治文化对小农政治心理的熏陶和制造是小农皇权心理根深蒂固的文化根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政伦合一的文化。这种文化与小农政治文化心理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互为因果的。一方面,传统的官方正统政治文化要反映小农的利益要求和政治心理倾向;另一方面,封建传统官方正统文化又把他们的的一套名为伦理主义实为等级主义、名为人伦本位实为皇权本位的政伦合一的社会伦理、封建礼教向小农灌输、强化,对其政治文化心理加以制造,化为小农的内在自觉和自发的心理追求。

以儒家为核心、正统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种政伦合一的文化。它既是一种道德学说,也是一种国家学说,其中国家学说论证封建国家君权至上的合理性,道德学说则阐述宗法制度的道德规范。国家制度和宗法制度的共同核心是强调“礼治”,强调人们之间的等级尊卑秩序。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孟子强调“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董仲舒把这些礼规定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宋明理学则更是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儒家学说正是通过这些伦理道德抑

范把宗法组织中对家长的“孝”推广到社会组织、国家政权之中去。皇帝被视为“父”，封建官僚被称作“父母官”，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做是这种父权的代表。因此，传统政治文化要求人们像子孝父般地臣对君忠、民对帝顺，臣守臣规忠于君、子守子规孝于父、妻守妻道贞于夫，正因为子孝妇从的伦理道德观念与民顺臣忠的国家阶级关系相一致，封建皇权专制统治才得到有效巩固。儒家文化就是以子孝妇从这些伦理道德的合理性，来论证臣忠民顺、君权至上的合法性的。

中国传统政伦合一的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皇权主义、等级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以维护皇权和等级制为核心，强调“礼治”和等级尊卑秩序，强调下级对上级、臣民对皇上的绝对服从，将社会的、家族的、整体的伦理价值置于个体价值之上，把人的正常情感、需要以致人的个性、人权、自由、独立人格和价值等等统统视为“人欲”，而由“天理”来加以铲除，从而使人的个性、人格、价值、人权的压制达到了极端。在这种文化专制和压迫下，人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等级上各就其位，每个等级所规定的社会义务代替了主体的需要，人们的人格只是两极人格：主人和奴才或皇上和臣民，从来没有独立的人格。而这种对人性的压制和消解则正是皇权专制主义能够存在的最佳文化土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专制制度唯一的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

人。”^[4](第 411 页)而儒家文化把道德视作为人处世的最高原则和最高层次，道德至上、王权至上、等级贵贱、三纲五常，这种形为人文主义、伦文主义而实为等级主义、王权主义的思想文化，正是封建皇权主义的理论基础。在儒家文化和封建纲常名教的熏陶和舆论下，旧时中国农村小农家家户户都悬挂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以昭示君主全能，拥有全权，能参天地，为治乱枢机，一切事物的最高裁决者。“君”高居中心位置，既代表天地，又代表亲师（最高的亲、师）。这也折射出经过中国传统政伦合一文化的熏陶，君是集天地与亲师为一体的，君既是政治权力的最高代表，又是天地神权的象征（宗教），还是最高的亲师（伦理）。因而，明君是中国小农顶礼膜拜的偶像。

参 考 文 献

- [1]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0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2]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3]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4]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全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责任编辑 叶娟丽)

Analysis on Small-peasants' political Mentality of Royalty and Its Formed Reasons

YUAN Yin-chuan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YUAN Yin-chuan (1965-), male, Doctor, Associate professor,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majoring in Marxism and Chinese Marxism.

Abstract Royalty is both a political system and a mode of social administration and a political awareness as well as political thought. The deep reasons of cultural mentality of royalty, which existed in Chinese feudal society for a long time were small peasants' godly awareness of non-subjectivity and royal mentality structure. The formed reasons of the small peasants' political mentality of royalty were both economic reason and class' reason as well as cultural reason.

Key words Small-peasant; political awareness; mentality of royalty; royalty